

評蘇俄「論毛澤東主義的歷史根源」

·下·

尹慶耀

二 中國文化的特徵

由上所述，我們就可看出蘇俄廣播裏所提出的只是對於中國文化的曲解。爲了不讓廣播混淆視聽的陰謀得逞，我們勢須就廣播提到的幾位先賢的學說，略述中國文化的特徵。

廣播提出得較多的，是老子、孔子、孟子、董仲舒和釋迦佛等。他們的思想與主張，自然有其時代背景在。

老子晚年，周室已衰，諸侯兼併，法令失常，社會上貧富不均。因而主張柔慈、寡欲、謙下，人主應清靜無爲，以「求清亂源」（註一七）。而反對人爲，以免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」（道五七章）。

孔子生當春秋之際，封建制度崩壞，社會秩序紊亂。因而正名分、宣教化、倡德政、尚禮治、尊王賤霸。孔子爲學則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」（論語里仁）。爲政則「苟有用我者，朞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」（論語子路）。其態度十分積極。然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」（孟子公孫丑上）。其進退又頗有分寸。

黃老政治始行於漢初。當時久亂初定，亟須休養生息。無爲守靜，造成了文景之治。但民富國強之後，又值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出，亟思有所作爲，黃老之說已不能滿足。於是武帝用董仲舒議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。董子雖曾受陰陽學說感染，甚至因談災異幾被處死，但他的天人合一論，純由儒家「天道」觀念演繹而來（註一八）。其名旨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」，更是儒家精神的發揚。

周昭王二十六年，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生於印度。佛教以明心見性，得無上正覺，普度衆生爲宗旨。惟教義中含有極深的哲理。後漢明帝時，佛教傳

入中國。此後建寺譯經，流布日廣，對中國的學術思想頗有影響。

孔子會問禮於老子（註一九），而道、儒兩家思想雖異，但流傳至後世，已頗有相通之處。道家的「自然」與「道」，和儒家的「理」與「天」，可大致相同；而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（道德經二五章），也與儒家的「天人合一」（不限於董子之說）相彷彿。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解釋：「自然」即「理」，在天爲理——即宇宙間之原理、定律；在人爲性爲情，即社會中之倫理、道德。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觀，才能有「民胞物與」（張橫渠）的胸襟抱負。

此一字宙觀應用在政治方面，就是一切措施要取法乎自然，順乎天理，應乎人情，則無爲而治，「治大國若烹小鮮」（道六〇章）；孔子所謂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」（論語爲政）。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；夫何爲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」（論語衛靈公）。不能順天應人，甚或反其道而行，則「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」（道二九章）。此之謂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」（孟子離婁上）。

道與天是完美無缺、至高無上的理念，而聖人則爲此一理念的化身；道家「抱一」，儒家「精誠」，都是聖人的修養；道家在莊子以後，始講真人、至人，老子只講聖人，他和孔子差不多，都講聖人之治（雖然彼此的理想標準不見得一致），而聖人在位，就可將上述理念，實現於人類社會。

佛教始源於印度。正如梁任公所說，佛學有宗教與哲學兩面，中國傳大乘，受之於後者較多，已超越福樂、禍災之說的迷信階段，由恐怖主義變爲解脫主義，由利己主義變爲愛他主義。故中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。至宋明間，儒佛即開始混合（註二〇）。

中國歷代學術思想，特重人生哲學，由個人修養而倫理道德而政治思想

，以仁愛精神一以貫之。各家學說，經二千年來之融匯凝聚，蔚成中國文化之若干特徵。舉其要者：

倫理

(一)倫理 孔子把君臣列在五倫之首，是只將君臣看作人與人的關係之一種。梁任公指出孔子說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是從仁者人也、人者人也演繹出來。既做人便要盡人道。君要盡君道，臣要盡臣道。「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」(大學三章)。全然是相互的關係，如此才是相人偶。所以孔子所說，是平等的人格主義(註二一)。儒家重倫理，認孝弟為仁之本。老子說：「六親不和而有孝慈」(道一八章)。他并不贊成六親不和。又說：「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」(道一九章)。那麼，孝慈正是他所希望恢復的理想了。仁是以愛為出發點的人與人的關係，是倫理的精神所在。在消極方面，儒家講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；在積極方面，就要「己立立人」「己達達人」，這是仁愛精神和倫理道德的發揚。

民本

(二)民本 書經說：「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；天明畏，自我民明畏。」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。「天矜下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」。大學說：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」(一〇章)。孟子說：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(盡心下)。董仲舒說：「唯天子受命於天，天下受命於天子」，似係主張天子對天負責。惟既然「天視自我民視」，天子也就不能忽視了民。因此又說：「且天之生民，非為王也。而天主王，以為民也。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，天子之；其惡足以賊害民者，天奪之」(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)。仍是以民為本。老子所謂「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」(道五七章)。為了民而要「我無」，歸根結柢，仍是民本主義。

平實

(三)平實 老子說：「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」(道六三章)。儒家

稱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。主張居易俟命，反對行險徼幸(中庸)。他們都不喜歡烏托邦式的幻想，尤其反對違反人性的制度。老子的理想，不過是便於無為而治的「小國寡民」(其真正動機在反對當時的兼併擴張)。孔子由小康以進大同，由各親其親進而而不獨親其親。其由內而外、由近及遠、推己及人的精神，是平實易行的。

和平

(四)和平 老子說：「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」(道二〇章)。他認為佳兵不祥，主張「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」(道二一章)。儒家尊王賤霸，認為「春秋無義戰」(孟子盡心下)，「故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」(梁惠王上)。「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『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』。明日遂行」(論語衛靈公)。孟子說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」(離婁上)。他們沒有一個是好戰的。關於鄰國相處之道，老子說：「大國者下流」，「故大國以下小國」(道六一章)。孟子說：「以大事小」(梁惠王下)。這也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精神。

中國正統思想，受之於儒家者最多。孔子晚年和言偃(子游)的一段談話中，透露出他的政治理想，那就是禮記禮運篇所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。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諸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」。這是一個政治經濟都廓然大公，沒有謀詐、不尚智巧，眾人各得其所、萬物各遂其生的社會，也可說正是老子所理想的社會。

孔子接下去的話是：「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為家。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。貨力為己。大人世及以為禮，城郭溝池以為固。禮義以為紀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，以設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賢勇知，以功為己。故謀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。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由此其選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謹於禮者也。以著其義，以考其信。著有功，刑仁講讓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勢者去，眾以為殃，是謂小康」。這樣看來

，孔子的正名、禮治、仁政等等，乃是大道既隱，不得已而求小康的作法。和老子所謂：「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慧智出，有大僞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」(道一八章)。以及「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」(道三八章)(註二二)。實際上是相通的。所不同者，老子以清靜無爲，復歸於自然，追求其理想。孔子則先求小康，以進大同。

近人常懷疑若干古籍，已經後人增補，常雜有各家思想。依照渡邊秀方在所著「中國哲學史概論」裏的說法，老子也是把中國固有思想集其大成的人。另一方面，佛教雖始源於印度，而佛學則宏揚於中國。我們認爲，唯其能採和各家學說，唯其能吸收外來文化，才使得中國文化越發博大精深，而又無損於其道統。

近代集中國文化之大成者，爲孫中山先生。他曾經說過：「余之謀中國革命，其所持主義有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者，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，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」(中國之革命)。他將中華民族的道統，與近代歐美政治、經濟思想融匯貫通，加以自己的創造發明，使得中國文化更具有現代化的內容，而孔子的大同思想，在實行方面，也就具有了科學的基礎。這是當代的中國文化，也是我們的立國的精神所在。

就目前中國的政策言：我們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而不剝奪其政治自由；實行社會化政策而不沒收私人財產；主張民族自決而不鼓勵國際戰爭；對外和平合作、技術援助而不干涉其內政。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具體發揚。然則，毛澤東今日之所作所爲，豈不完全與中國文化背道而馳？他乃是中國文化的叛徒！

三 毛澤東主義的歷史根源

蘇俄的其他廣播中，常常重述毛澤東先前的話，說他會如何強調學習蘇俄的重要，與他今日的態度是前後矛盾。但爲了嫁禍，又把毛澤東主義的歷史根源歸咎於中國文化，豈不也自相矛盾？我們要強調指出：毛澤東主義的歷史根源就是馬列主義。

毛澤東在「文化革命」中，焚燒中國古籍、破壞孔廟、道觀、佛寺，但決不損傷馬列主義「經典」和馬、恩、列、史像。

馬克思的共產主義，經列甯「發展」爲馬列主義，但列甯加添了些什麼呢？這大致有以下幾點：①工農聯盟的理論；②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；③帝國主義的理論；④民族解放的理論；⑤階段革命的理論；⑥革命的戰略與策略的理論。

這些都被毛澤東承襲了下來。其中列甯的工農聯盟理論，是利用農民階級的力量，從事工人階級的革命。這發展成爲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理論；列甯的民族解放理論即源於帝國主義論，是披起民族主義的外衣，致力共產主義的赤化，經由東方到達西方的戰術。這發展成爲毛澤東以亞、非、拉丁美洲爲革命運動的核心，聯合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理論；列甯的階段革命理論，是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爲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策略。這是毛澤東「新民主主義論」的藍本。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綱裏，就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說法。列甯在他的「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」一文裏指出三個要點：(A)無產階級能够而且應當做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或領導者；(B)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完成，應即刻開始轉變成爲社會主義革命；(C)採用武裝革命。在列甯之後，史達林也說過：綱領可以由兩部分構成，最高的和最低的這類話。毛澤東在「新民主主義論」中，所提出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，現在綱領和將來綱領，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」，因爲有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，就不屬於「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」，而屬於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」，以及現在「新民主主義」將來共產主義的論調，均脫胎於此。

馬克思主義只有國家論沒有政治學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，是由列甯加進去的。一九三〇年史達林曾經說過：「我們贊成國家的萎謝。可是我們同時也贊成加強無產階級專政，因爲它是歷來最有力最強大的統治力量。爲了準備政府權力萎謝的條件，政府權力必須先達到最高峯，這便是馬克思的公式。這是不是有點「矛盾」？是的，這是「矛盾」。然而，這矛盾就是實生活，而且完全合乎馬克思的辯證法」(註二三)。毛澤東在「矛盾論」中所說：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的專政，正是準備着取消這種專政，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」。還有他在「論人民民主專政」(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發表)一文裏，關於「消滅國家權力」的解釋，不都是以此爲藍本？而且，毛澤東在該文中寫道：「你們獨裁」。可愛的先生們，

你們講對了，我們正是這樣」。這樣的筆調，也只有史達林全集裏才找得到。

毛澤東「聯合多數，孤立少數，各個擊破」等鬥爭技巧，源自列甯戰略與策略的理論，史達林曾在「列甯主義問題」一書裏對所謂戰略與策略大加發揮，迄今仍為共黨所遵循。按毛澤東的「統一戰線」策略，是受命於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決定。他的「紙老虎」論也是模倣自列甯。一九四六年八月，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談話時，初次提出紙老虎論。這篇談話於一九六〇年收進「毛澤東選集」第四卷時，編者特別註明：這「同列甯把帝國主義看做『泥塑巨人』看做『空架子』一樣」。而且，就是「文化革命」一詞，也是創始自列甯。

史達林曾經說：「列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」。中共說：「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，提出了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』的戰鬥口號。……在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鬥爭興起的歷史條件下，列甯提出了『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』的戰鬥口號。……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毛澤東同志根據國際階級關係和力量對比的新變化，提出了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口號」（註二四）。這樣毛澤東就成了馬列主義的直接繼承人。在「文化革命」期中，他又登上了當代馬列主義的「最高峯」。這是蘇俄所不能忍受的。平心而論，現今蘇俄的理論，或許更容易欺騙自由世界。但毛澤東主義却更接近當年的列甯。

然則毛澤東和蘇俄之間，究竟有什麼差別呢？其實所爭的也只是老問題：

（一）過去蘇俄就有過先建設一國社會主義或先從事世界革命的爭執，史達林主張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。現今蘇俄主張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，是社會主義國家最高的國際主義義務，只是把「一國」擴大成社會主義「陣營」，基本上仍是史達林的主張。在這一點上，毛澤東沒有效法史達林，他認為亞、非、拉丁美洲是「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」，應該先搞世界革命。然而，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，是要在資本主義國家的「包圍」中，先把蘇俄建設成世界革命的壘壘，進而再赤化全世界。現今俄共的主張，基本上與此相同，要把社會主義陣營作為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。不過，它們目前就在經援新興國家、支援民族解放運動。它們從未想過要放棄世界革命。

（二）列甯講過戰爭不可避免，但為了儘量拖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戰爭爆發的時間，也講過「和平共存」。現今蘇俄側重後者，而中共側重前者。但蘇俄從未忘記擴充軍備、充實它的國防力量，當前它也還在增加其國防費用。

（三）列甯講武裝革命，也講經濟影響。現今毛澤東鼓吹「人民戰爭」，蘇俄側重經濟競賽。但蘇俄的經濟援助、技術援助，不是為了「吸引」受援者走社會主義道路？為什麼它的軍事援助常常超乎經濟援助之上？

（四）在經濟領導方式中的爭論是：究竟應該採取行政方式，即一切經濟活動都由上級命令規定施行；還是應該採取經濟方法，即利用利息、利潤、獎金等等，使企業經營者發揮其主動性。現今中共固守前者，而蘇俄提倡後者。但目前蘇俄并未放棄中央計劃方式，各企業主要的生產指標，仍由上級規定。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的莫斯科廣播中，談到「蘇聯領導國民經濟的經濟方法」時說：在二次大戰後，尤其是最初的時期，我們（蘇俄）只能運用極有限的財政和物質方面的資源，因此分配這些財力和物力，是由行政方式，也就是由上級進行的。於是就製定幾十個指標的計劃，經常束縛地方和集體的積極性。但是在那個時期，沒有其他出路。我們經常發展那些生利和上繳利潤大的以及最重要的部門和企業，優先發展那些沒有這些部門，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本身將受打擊的部門和企業。可是，假如這成爲一種理由，毛澤東是否也可以引用來辯解他當前的政策呢？

（五）爲了鼓勵勞動者增產，共產國家也有兩種方式：一種是物質鼓勵，一種是精神鼓勵。毛澤東堅持後者，而蘇俄強調前者。但蘇俄是否放棄了後者呢？沒有。所謂物質鼓勵，就是提高工資、獎金、福利等有關改善生活方面的鼓勵，蘇俄已開始試驗，但改善的幅度有限。所謂精神鼓勵，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競賽運動之類，目前蘇俄已改稱突擊手運動。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題目爲：「物質與精神鼓勵相結合」。其中說：「我國（蘇俄——下同）爭取共產主義勞動積極性和突擊手運動，……正好是在我國採取了旨在改善和提高工資的重大時期發起和開展的。現在每兩個工人和職員當中，就有一個參加這種運動」。

四 結 論

毛澤東是中國文化的罪人，却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。馬列主義是當代世界思潮中的一股逆流，而毛澤東又是這股逆流中的死硬份子。廣播裏把毛澤東主義的歷史根源往中國文化上推，是有意顛倒是非、淆亂黑白。廣播既然常常引用中國古籍，我們也拿孟子和梁惠王的對話來作結束罷。

毛澤東和蘇俄之爭，只是埋葬自由世界的策略和方式的不同。在「梁惠王上篇」中，孟子說：「殺人以梃與刃，有以異乎？」梁惠王說：「無以異也」。

毛澤東指責蘇俄向資本主義復辟，蘇俄指責毛澤東提倡貧困哲學。但毛澤東過去是以俄為師，這一點廣播裏也常常強調。中共曾經說：「蘇聯的今天，就是中共的明天」。當然，由於毛澤東的左傾冒進，更由於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相抵觸，早使得中共比蘇俄更沒有明天。但由前引廣播裡敘述的若干事實看來，我們可以說：中共的今天，就是蘇俄的昨天。蘇俄確實比較中共前進了一步，但二者的作法，也僅止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。

孟子對梁惠王說：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」梁惠王說：「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」。

註一：請參閱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史達林「勝利衝昏頭腦」一文。史達林全集第十二卷。

註二：毛澤東曾主張以三分之一土地播種穀物、三分之一栽培菓園、三分之一植樹造林，是為「三三制」。「八字憲法」為「土、肥、水、種、密、保、管、工」。

註三：「燕山夜話」第一集。鄧拓曾任「人民日報」總編輯。被整肅時為中共北京市委書記、主管文化宣傳兼負「前線」雜誌編務。

註四：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北平「首都抗大兵團」根據「北京工業學院紅衛兵」資料編寫之大字報，曾作此透露。

註五：請參閱楊幼炯著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

註六：關於「曲則全」等語解釋，請參閱日本文學博士諸橋徹次著：「老子講義」。東京大修館書店本。

註七：鄧拓「燕山夜話」第四集，有「智謀是可靠的嗎」一文，譏諷毛澤東，頗值得一讀。

註八：萊卡（Laila）為犬之一種，蘇俄人造衛星上所載者即此。

註九：[日]甫洛夫（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8—1936）為俄著名生理學家及心理學家，曾獲諾貝爾獎金。本人為虔誠宗教徒，且曾批評蘇維埃政權。惟蘇俄當局不以為忤，反而大力支持其研究工作。蓋蘇維埃政權認為其「條件反射」理論，可為唯物論意識形態之有力佐證。現主持該研究所者為其子女與學生等。

註一〇：請參閱梁任公著「孔子」，中華書局版，五六頁。

註一一：錢穆著「國史大綱」，上冊一〇二頁。

註一二：梁著「孔子」，一三頁。

註一三：請參閱錢著「國史大綱」及「中國歷史精神」。

註一四：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「解放社」譯本二二〇及二五三至二五四頁。

註一五：「王道和霸道」，「燕山夜話」第四集。

註一六：在註四所舉「大字報」中，同時透露毛澤東在中共十中全會中說：一九五八年下半年，黑魯曉夫提出「中（共）蘇聯合艦隊」計劃，想把中國沿海置於蘇俄的控制下，將中共加以封鎖。被毛拒絕。

註一七：請參閱商務印書館版楊幼炯著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及陳安仁著「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」。

註一八：請參閱渡邊秀方著劉侃元譯「中國哲學史概論」。商務印書館印行。

註一九：按老子之姓氏生年，頗多爭論。今依楊家駱先生之說，老子生存年代為紀元前五六一至前四六七年，孔子為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年。孔子曾兩度往見老子。詳請參閱世界書局四部刊要本「老子注附老子新考述略」中之「老子新傳」。

註二〇：梁任公著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」，中華書局印行。

註二一：請參閱梁著「孔子」，一三至一四頁。

註二二：請參閱梁著「孔子」，四一頁。

註二三：轉引自利却·克特欽編、戴潮聲譯：「甚麼是共產主義」。明華書局印行，五二頁。

註二四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「人民日報」及「紅旗」兩編輯部文章：「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『聯合行動』」。